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

ZHONGGUO JINDAI DAZHONG CHUANMEI
YU ZHONGGUO JINDAI WENXUE

中國近代大眾傳媒
與中國近代文學

蔣曉麗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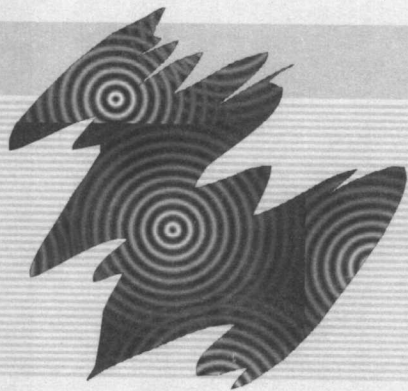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

四川大學十五“211工程”重點建設學科項目

中國近代大眾傳媒 與中國近代文學

蔣曉麗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近代大眾傳媒與中國近代文學/蔣曉麗著. —成都:巴蜀書社, 2005.6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

ISBN 7-80659-725-5

I. 中... II. 蔣... III. 大眾傳播-傳播媒介-關係-近代文學-研究-中國 IV. ①G219.295②I20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46324 號

中國近代大眾傳媒與中國近代文學 蔣曉麗 著

責任編輯	李 蓓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028)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028)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電話:(028)84122206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張	10.25
字 數	250 千
書 號	ISBN 7-80659-725-5/I·241
定 價	24.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
▼
▼
▼
▼
▼

多元文化與漢語文學批評新傳統 周嘉著

中國近代大眾傳媒與中國近代文學 蔣晚麗著

異質文化語境下的女性書寫——海外華人女性寫作比較研究 肖薇著

三葉集——德語文學·文學翻譯·比較文學 楊武能著

戰爭本體的藝術轉化——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戰爭小說創作論 陳思廣著

文學智慧——走近西方小說 冀翰熊著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編委會

主 編：曹順慶

編 委：馮憲光 王曉路 李 怡

徐新建 劉亞丁 閻 嘉

吳興明 段志洪 汪啓明

楊宗義

秘 書：姜 飛

目 錄

引 言	1
第一章 中國近代大眾傳媒與文學的關係	11
第一節 人類傳播技術對人類文化的影響	12
第二節 中國近代大眾傳媒的出現對大眾文化的影響	18
第三節 中國近代大眾傳媒與中國近代文學的關係	28
第二章 中國近代大眾傳媒與傳媒話語權的確立	35
第一節 大眾傳媒的基本特徵	41
第二節 中國近代大眾傳媒的興起與發展	45
第三節 中國近代大眾傳媒話語權的確立與知識分子對傳媒話語權的爭取	56
第三章 中國近代大眾傳媒與文學言述樣式的演進	74
第一節 近代大眾傳媒對通俗文學的呼喚	74

第二節	近代大眾傳媒對白話文的推動	83
第四章	中國近代大眾傳媒與文學傳播方式的嬗變	88
第一節	不獨立的文學大眾傳載方式——副刊	88
第二節	相對獨立的文學大眾傳載方式——文藝報	99
第三節	完全獨立并相對專業的文學大眾傳載方式——文藝期 刊	105
第五章	中國近代大眾傳媒與西方文學的譯介	127
第一節	出版業與西方文學的譯介	129
第二節	日譯西書的引進	135
第三節	西方文學的譯介	137
第六章	中國近代大眾傳媒與近代文體的產生	171
第一節	大眾傳媒與近代“新聞文學”的產生	171
第二節	時務文體	183
第三節	雜文與小品文	186
第四節	紀實性社會小說	189
第七章	中國近代大眾傳媒與作家群體、文學流派及文學運動的 形成	198
第一節	傳媒稿酬制度的建立與職業作家群體的產生	199
第二節	大眾傳媒與鴛鴦蝴蝶派	204

第三節	大眾傳媒與文學革命運動的興起·····	210
第八章	中國近代大眾傳媒與中國文學的斷裂與延續·····	228
第一節	近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的轉型和中國文化的斷裂 ·····	228
第二節	中國古代雅與俗的對立與文化轉型中的逆轉機制 ·····	236
第三節	雅與俗的轉換機制與儒家正統話語權的確立·····	252
第九章	近現代之交文學雅俗觀念的分化與中國文學發展趨勢的 逆轉·····	273
第一節	近現代之交雅俗觀點的分化與“五四”新文學的困惑 ·····	273
第二節	“洋”精英意識與中國雅俗文學轉換機制的破壞·····	282
第三節	“洋雅”與“土俗”之戰：對鴛鴦蝴蝶派的批判·····	289
參考書目	·····	307

引 言

大眾傳媒與文學的關係問題，近年來逐漸被學術界所關注。本書從大眾傳媒與文學的關係這一跨學科研究角度，首次系統地研究中國近代大眾傳媒與近代文學的發生與發展關係，以及中國近代大眾傳媒在近代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現代化過程中的獨特作用，並進而探討近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的斷裂與延續的傳媒動因以及中國“雅文學”與“俗文學”的轉換機制和在近現代的逆轉方式，以便正確認識大眾傳媒重要的文化功能，正確理解中國近代文化與文學的發展演變規律，正確評價“五四”以來的新文學，這對於真正推進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重建中國文化話語都有着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本書的第一個主要內容，是系統研究中國近代大眾傳媒對中國近代文學的重要作用及相互關係。傳媒與文學有着密切的關係，正是依靠傳媒的刊載、評論、傳播，文學纔得以保存、流傳和發展，纔能對人民、對社會、對美學觀念與道德倫理等方面產生廣泛影響。特別是自近代大眾傳媒產生以來，傳媒與文學的關係更加緊密。正如西方著名傳媒文化學者麥克盧漢所說：我們開

始意識到，新媒介不僅“為我們創造了幻覺世界，它們還是新的語言，具有嶄新而獨特的表現力量”^①。然而，多年以來，由於學科分化的人為阻隔，傳媒對文學的作用以及傳播學與文學的關係被我國學界長期忽視，“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媒介的一個非常有限的側面。結果，我們很難把自己的注意力釋放到媒介影響的一切領域”^②，嚴重地影響了學術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今天，隨着大眾傳媒的日愈興旺和重要，我們再也不應忽略這一重要學術問題^③。

本書的第二個主要內容，是試圖通過中國近代大眾傳媒的興起與中國近代文學發展的關係，揭示出從前學術界所沒有充分認識到的一個重大學術問題，即：中國文學在近代之交為什麼會有“斷裂”之說，中國文學真的斷裂了嗎？本書提出，中國文學的斷裂其實僅僅是正統文學的斷裂，是文人文學的斷裂，文言表述方式的斷裂，“雅”文學的斷裂。

從斷裂的因素來看，至少有兩大重要因素，即外因與內因。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那種祇強調外因，或者說祇強調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衝撞而導致文化斷裂的看法，顯然是片面的。關鍵的問題在於：什麼是內因？而這正是本書探索的重點。

① 《麥克盧漢精粹》，第7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② 同上。

③ 關於近代傳媒與文學的關係，學術界已有人初步涉及這一問題，如郭延禮《近代西學與中國文學》（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0年），以及陳平原《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等論著提及近代傳媒與文學關係問題。但尚無系統的研究論著問世。

本書提出，導致近代中國文化“斷裂”或“轉型”的外因是西方文化，而內因則是長期以來的中國雅文化與俗文化之爭、正統與民間之爭、文言與白話之爭、精英（文人）與庶民（大眾）之爭。正是這種內在的鬥爭，纔形成了中國文學發展的文體演變特徵，尤其是唐以後文體演變的軌迹：唐詩、宋詞、元曲（戲劇）、明清小說。這種演變，分明體現了“俗”日益戰勝“雅”，“小道”（戲曲小說）日益戰勝正統，白話日益戰勝文言。也正是這種日益強盛的內驅力，推動着庶民文學前進。當外力強烈衝擊到來之時，當西方文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橫掃中國之際，通俗文學、白話文學就得到了一次千載難逢的發展良機，在大眾傳媒的强大影響力中乘勢崛起。小說、戲劇從昔日的“小道”一躍而成“大道”，以至於連梁啟超這樣的大文人，也不得不抬出昔日的“小道”來承擔“大道”之任，認為“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也”。“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① 黃人於1907年在《小說林發刊詞》中指出：“昔之視小說也太輕，而今之視小說又太重也。昔之於小說也，博奕視之，俳優視之，甚且鳩毒視之，妖孽視之；言不齒於縉紳，名不列於四部，私衷酷好，而閱必背人；下筆誤微，則群加嗤鄙。”從前將小說貶得一無是處。而時移事改，當正統詩文已不能承擔“大道”之任時，昔日的“小道”便取而代之：“今之時代，文明交通之時代也，抑亦小說交通之時代乎！……則吾國今日之文明，為小說之文明可也；則雖謂吾國異日政界、學界、教育界、

^①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

實業界之文明，即今日小說界之文明，亦無不可也。”^① 1912年，王國維作《宋元戲曲考》一書，其“元劇之文章”一章指出：“元雜劇之爲一代之絕作，元人未之知也。明之文人始激賞之。……三百年來，學者文人，大抵屏元劇不觀。”這種對元劇的輕視態度，並非是因爲元劇無價值，而是中國正統文化的偏見。祇有當正統價值觀崩潰之日，元雜劇真正的價值纔可能被充分肯定，纔可能被稱爲“一代之絕作”！而這“絕作”的“絕”處，在王國維看來，恰恰是“俗”的方面，是“白話”的運用等等；“古代文學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語，其用俗語者絕無。又所用之字數亦不甚多，獨元曲以許用觀字，故輒以許多俗語或以自然之聲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學上所未有也。……由是觀之，則元劇實於新文體中自由使用新語言”^②。以前元劇的“俗”、“淺”、“白話俗語”等等被正統文化視爲缺點之處，在中國近代却一改前論，恰恰成了元劇的優點而被大加贊頌。這正是“俗”戰勝“雅”，“小道”戰勝“大道”，“白話”戰勝“文言”的明證！而這一大轉變，並非憑空而來，而是醞釀了數百年乃至上千年：“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爲六朝，變而爲近體，又變而爲傳奇，變而爲院本，爲雜劇，爲《西廂曲》，爲《水滸傳》……”（李贄《童心說》）中國文學的這種由雅而俗，由文言而白話的內在趨勢，愈演愈烈，這並非某個別人所能爲，亦非某個時代文人所能爲，乃時勢所然，大勢所趨。到了近代，經西方文化

① 郭紹虞等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四冊，第24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0年。

② 王國維：“元劇之文章”載於王國維著《宋元戲曲考》，1912年。

的猛烈撞擊，中國文化的內部抗爭以及近代大眾傳媒的推動，在這外力與內力的夾擊之中，正統的詩文終於敗落，束縛人的文言表述方式終於讓位於白話言說方式，為民衆喜聞樂見的“俗”文學終於戰勝了士大夫咬文嚼字、堆砌典故的“雅”文學。從這個意義上說，自近代以來的所謂文化與文學斷裂，祇是正統精英文化的斷裂，是文言表述方式的雅文學的斷裂。而這種斷裂，並非真正的、完全的斷裂，它同時是中國文化與文學的延續，即是中國俗文化與俗文學的勝利，是以白話為表述方式的小說與戲劇等“小道”文學的勝利，是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庶民文學的勝利！正如陳獨秀於1917年在《新青年》發表著名的《文學革命論》中所指出：“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通篇論述的是俗文學與雅文學之爭。他大力批判正統的雅文學，力倡通俗新鮮寫實的俗文學：“國風多里巷猥辭，楚辭盛用土語方言，非不斐然可觀。承其流者兩漢賦家，頌聲大作，雕琢阿諛，詞多而意寡，此貴族之古典之文之始作俑也。……元明劇本，明清小說，乃近代文學之粲然可觀者，惜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爾流產。以至今日中國之文學，委瑣陳腐，遠不能與歐洲比肩。此妖魔為何？即明之前後七子及八家文派之歸、方、劉、姚是也。此十八妖魔輩，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稱霸文壇。反使蓋代文豪若馬東籬、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諸人之姓名，幾不

爲國人所識……”可以說，近現代的“文學革命”，革的是傳統文人精英“雅”文學的命，革的是以文言表述的正統（或曰道統）文學的命，而大力倡導的是中國非正統的俗文學，倡導的是以白話表述的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庶民文學。一言以蔽之，近代以來的文學革命，是大眾通俗文學的勝利。

本書的第三個主要內容，是論證爲什麼近代俗文學能夠戰勝傳統雅文學：這是因爲印刷技術的發展、大眾傳播的產生以及近代大眾傳媒話語權的崛起所致。這也是本書致力探討的又一個核心問題及難點問題。

在近代以前，掙扎了數百年乃至上千年的通俗文學，爲什麼一直不能獲得勝利？這固然與道統勢力的強大，與統治階級的愚民政策，與正統文人價值觀的偏執與僵化等方面有關，但同時也與中國古代“街談巷議”、口口相傳、“勾欄瓦舍”、說書談唱以及雕版刻書、坊間傳抄等等傳播手段和傳媒方式的落後無不相關。俗文學的勝利，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廣泛的認識和接受，而缺乏大眾傳媒的中國古代，不可能做到最廣泛、最迅速的傳播，也就不可能有廣泛而普遍的接受和認同。到了近代，傳播手段得到了空前的發展，這爲通俗文學的勝利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條件和載體保證。然而正如前面所言，多年來，學界忽略了近代大眾傳媒的興起對近代文學的作用，“由於工業生產技術的發展，文化幾乎成了可以無限複製的，這一事實向有關文化和藝術在社會中

的作用的傳統觀念提出了值得重視的問題（本雅明：1973）”^①。正因為傳播工具和技術手段的進步，導致大眾傳媒的興起，而大眾傳媒的興起，又導致了傳播權力在原有基礎上的極大普及，傳播權力的普及，導致了對更多、更通俗易懂的文學作品的需求的產生、通俗文學需求的產生、大眾文化消費市場的形成又導致了白話文學傳向四面八方。正因為近代報刊的興盛，一個新興的話語權——大眾傳播話語權的崛起，庶民文學纔能登高一呼，舉國振動，纔能與強大的傳統話語權相抗衡；正因為大眾傳媒對西方文化與文學的刊載、評論與譯介，纔能使中國的俗文學，即小說、戲劇、白話文學在異域找到知音和同盟軍。中國近代大眾傳媒的興起，成為中國俗文學打倒雅文學的强大力量，成為中西小說、戲劇聯手打倒中國正統詩文，打倒“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的强大力量，成為中國近現代文化與文學發展的助推力。大眾傳媒使中國近代文學發生了質的變化：從精英走向大眾，從傳統文人走向庶民，從書面文言走向口語白話，從正統詩文走向小說戲劇……近代大眾傳媒的興起，為中國的通俗文學提供了廣大的舞臺，通俗文學纔有了真正抗衡傳統正統文學的場地；在這個舞臺上，人們譯介西方小說，引進西方文藝思想，撰寫百姓生活，反映大眾心聲。白話表述方式鋪天蓋地而來，粗識文字的庶民大眾，莫不喜聞樂見。白話文學借助大眾傳媒之力，迅速騰飛，終於佔領了正統與主流的地位，把昔日不可一世的“選學妖

^① [英] 多米尼克·斯特里納蒂：《通俗文化理論導論》，第9頁，商務印書館，2001年。

孽”、“桐城謬種”打得鼻青臉腫。可以說，大眾傳媒的興起，是中國文化與文學轉折的關鍵，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大眾傳媒話語權力打敗了精英話語權力；沒有大眾傳播的興起，就沒有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的勝利，就沒有中國近現代文學的蓬勃發展。

本書的第四個主要內容是通過對近代文學與大眾傳播關係的考察，較系統地論述了近代文學與新聞傳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現象，論證了文學與新聞從混淆不分到逐漸區分，進一步從互相影響到獨立發展的關係演變中，大眾傳媒對文學賦予的新聞傳播特徵，甚至催生出的新的文學類型等狀況，同時，通過對具有“新聞文學”性質的文體，如“轟動一時的時務文體”，以及魯迅最擅長的“雜文”、具有紀實性特徵的社會小說的分析，進一步說明傳播方式和手段對文化和文學的變革所起的巨大作用。“乍一看，新媒介僅僅是傳輸過往成績和既定思維模式的代碼”。但是，“印刷術使文學創作成為可能，它不僅僅是給文學編碼”^①。從傳播媒介的角度來闡述中國近代文體產生的特徵與文學發展的規律，對於學界更準確地認識中國近現代文學不無助益。

本書的第五個主要內容是論證了中國近代到現代之交文學雅俗觀念的又一次分化與中國近現代文學發展趨勢的逆轉。本來，近代文學借助大眾傳播話語權力，借助西方文化與文學的外力，戰勝了傳統的精英文學，或曰“雅”文學，一時間傳統詩文節節敗退，通俗小說大獲全勝；中國小說創作形成了近代文學的第一

^① 《麥克盧漢精粹》，第407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次高峰，小說創作數量之多，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驚人程度。據江蘇社科院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統計，中國古代總共有小說 502 種，而 1901 年至 1911 年十年間即創作小說 529 種，也就是說，清末 10 年間的小說創作就超過了中國古代全部小說的總和。據日本學者樽本照雄《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統計，近代小說共有 7466 種之多！這是一個驚人的量的飛躍，其中也蘊含着質的變化。如果中國文學照這一趨勢發展下去，前程未可限量。“五四”新文學的主要倡導者胡適，是肯定這一發展趨勢的，他指出：“吾每謂今日之文學足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者，獨有白話小說（我佛山人，南亭亭長，洪都百煉生，三人而已。作者注：此三人即吳趼人、李伯元、劉鸞）一項。此無他故，以此種小說皆不事模仿古人（三人皆得力於《儒林外史》、《水滸》、《石頭記》，然非模仿之作也），而惟實寫今日社會之情形，故能成真正文學。”^①但“五四”之後新文學的發展，却逐漸偏離中國白話文學、俗文學傳統，操起了“洋”話語，寫出許多歐化文章，一步步走向了“洋”精英立場，並進一步以“洋”、“雅”來壓“土”、“俗”，發動了對“鴛鴦蝴蝶派”等通俗文學的批判。隨着洋精英意識的高漲，中國近代俗文學的趨勢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正如有學者所指出：“‘五四’作家所造成的，其實是另外一種同樣高雅的‘貴族文學’。”^②這種洋精英意識主導下的高雅文學，大肆批判中國通俗文學，使脫離大眾的精英意識主

①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

② 陳平原：《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第 19 頁，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